

人类学与灾难研究的范式^①

苏珊娜·M·霍夫曼¹, 安东尼·奥利弗-斯密斯²/著, 彭文斌/编译

(1. 旧金山大学 人类学系; 2. 佛罗里达大学 人类学系)

摘要:近年来,人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对灾难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将灾难中交汇的环境、生物和社会文化三个因素纳入思考的范畴,并在研究中形成了“考古与历史”、“政治生态学”、“社会文化与行为”和“应用与实践”几种范式。这些范式之间相互关联,吸取了其他学科的灾难研究经验,以人类学整体观的视野和微观的民族志田野方法对灾难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人类学;灾难研究;范式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Q9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14)01-0030-06

DOI:10.13727/j.cnki.53-1191/c.2014.01.006

灾难有时以地震或核泄漏的方式突然袭击,而在其他场合,它们会在长时段里汇集,如干旱或中毒的缓慢进程。不管它们以何种方式到来——突然暴发或缓慢发生,灾难都是一种全方位的事件,在暴发时,它们会波及到人类社会的环境、生物和社会文化各个层面。就其构成而言,灾难发端于环境、社会和技术汇聚的网络,以及地方、人群和人类物质与非物质文化构建的交汇点,正是由于这三方面的聚合才形成灾难。灾难在展开的过程中,又重新勾连其因果端口的各因子。

早在20世纪初,社会科学家们就开始探讨灾难问题。尚穆尔-普林斯(Samuel Prince)研究过加拿大哈利法克斯(Halifax)港口军火爆炸(1920年)对社会变化的影响。^②不过,普林斯对社会结构研究的潜力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才被人们重视。由于灾民面对的困境给社会带来了措手不及的压力,对受灾人口的管理也成了个紧迫的问题。早期的灾难研究大多集中在自然和技术事件的物理因素,研究者们试图找到技术性应对方法。社会科学家对

灾难的研究则将其视为无法预测的、突降于人类社区的极端事件。他们认为灾难脱离了日常秩序,灾后的恢复是尽早从看得见的损耗或可计算的壓力中重新回归以前的状态。从20世纪50到70年代,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灾难的预警、影响以及后续阶段的个体与机构行为的呈现,而极少从历史角度和社会文化模式来进行思考。

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种新的研究态势开始出现,灾难和导致灾难发生的灾害被重新检视,灾难被重新定义为基本的、通常也是环境的周期性元素,更重要的是,在某种程度上灾难是人类自身构建起来的。^③社会范畴的构建被加入到灾难的网络之中。某些社会在危险的地带建立空间,而且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常常将其人口的一部分置于比其他人更危险的境地,而社区成员对此并非不知情或无所作为,他们对其物质环境、生活和商业行为及相应的风险进行评估,形成了一套观念和策略来确保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环境的理解。研究者们也开始把人类的技术看成是一把双刃剑——

【作者简介】苏珊娜·M·霍夫曼(Susanna M. Hoffman),美国知名灾难人类学家,曾任旧金山大学人类学教授,现为独立学者和作家;安东尼·奥利弗-斯密斯(Anthony Oliver-Smith),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美国灾难人类学研究学者,联合国灾害应对咨询专家。

彭文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大学亚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资深访问学者。

① 本文原文“Anthropology and the Angry Earth: An Overview”(人类学与愤怒的地球概述),见Anthony Oliver-Smith和Susanna Hoffman编“*The Angry Earth: Disaster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愤怒的地球:人类学视野中的灾难),本文由Anthony Oliver-Smith和Susanna Hoffman专门授权以期刊形式翻译和发表,为使本篇独立成文,译者对标题作了更改,也删去了书的内容介绍部分。

② S. H. Prince. 1920. *Catastrophe and Social Change. Based on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Halifax Disaster*. Unlished PhD. the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③ K. Hewitt. 1983. *Interpretation of Calamity*. Boston: Allen & Unwin.

在某些方面提高安全性的同时(如飓风预报或抗震工程),也增加了人类应对灾难的脆弱性。从人类生活的黎明到原子裂变的时代,人的技艺对环境和生境都造成了危害。社会科学的灾难研究者们认为,灾难不能单单通过人类生存的物质层面来理解和减缓,社会因素同样攸关,如生计模式、资源利用、修房造屋、工具发明、社会结构的制约、权力的分配、地方认同等等,还有更多的社会文化成分都交织在灾难的漩涡之中。

社会成因的引入,彰显了灾难也涉及到历时性。灾难不仅从突然暴发的危机中产生,也是长时段过程的结果。孕育或最后终结于人们视为可怕、有害和通常恐怖的紧急状态,实际上是他们鼻子底下彰显或悄悄汇聚而成的,牵涉的过程包括人们对物质基础的适应、人类对环境的操控和经营、以及社会文化体系、信仰与民族精神的构建。

随着研究者们对自然和技术灾难构造理解的深入,人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与灾难研究关系也变得日趋明显。就实证层面而言,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将灾难中交汇的三个层面——环境、生物和社会文化纳入思考。因此人类学的调查框架与灾难研究的分析标准完全匹配。^①而且人类学研究中的发展和比较观与灾难研究的专门要求也吻合。人类学从起点开始研究人类的生存,结合考古学、长时段历史记录和人类生活逐渐展开的场景来进行探讨。人类学以小见大,将一社会的状况和其他社会相比较,它将个人、群体及其复杂的社会文化世界和整合置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领域里加以分析,正是这一交融构建起灾难成因的一般场景。人类学领域更进一步从无数偶发事件的均衡比中获得普遍性结论,它关注的是社会与文化的持续与变迁——这也是灾难影响研究的重要问题。它高度重视人类适应性这一人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灾难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基本层面,即怎样与其物质环境调谐及其生存性的关键问题。最后,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全方位涵盖人口与地域,其大多数研究都在非西方语境中展开。迄今为止,虽然大多数的灾难形成并在其他地方的人口中产生影响,多数的灾难研究——大多源于社会学和地理学领域,仍集中于欧美的场景。

近年来,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灾难的

研究领域。首先,人类学以其重要的方法——民族志田野工作对灾难的研究作出了贡献。民族志方法,包括叙述方法的引进极大地彰显了灾后恢复与微观社会组织的变化与调适之间的关系。人类学与考古学结合,揭示出文化系统如何常常包含了与环境的长期协调或矛盾关系,人们——至少在原初的状态下——建立起常规的程序来克服环境的挑战和保障其延续。实际上,地方性的社区普遍都表现出对其环境的更为广泛的理解,脱离整体观的灾难干预常常会破坏当地人的适应能力,减弱而不是推进灾后的复苏。早期的研究几乎全部集中于灾难的应急反应和作为第一梯队的机构干预,对于常年累月的恢复重建中的波动情况很少触及。但是灾难是长期的事件,在尘埃落定前,会有很多的周折。人类学的长时段视野和深入的田野工作对于理解灾难造成的长期效应很有力度。人类学的观察更进一步强化了对造成人的脆弱性的诸因素的理解,如年龄、性别、社会阶层、语言、宗教、族群和其他的差异。人类学从基础层面探索谁最可能是灾难的牺牲品?何种惯习会导致安全观念与措施的不平等?

灾难人类学的取向

迄今为止,灾难的人类学研究是由一小部分研究者来进行的。虽然在研究灾难的方法上各式各样,但或多或少对灾难问题的看法都呈现出一定的一致性。灾难被视为导致某一事件发生的进程,涉及一源于自然或技术领域的潜在的破坏性因子与一社会形成的脆弱条件下的人口群的结合。该进程和随后事件的发展对物质设施和某一社区的主要社会组织成分造成了破坏或损失,其程度达到该群体的基本功能中断或丧失,然后是不同程度的个体或群体陷入困境或导致社会的解体。

人类学探讨灾难的每一种取向对普遍意义上的灾难研究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并且从一系列有关人类灾难的广泛场景中阐明方法和解析数据。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提出了“国际减灾十年”的口号,在自然和技术灾难频率和程度不断增加的气氛中引领我们进入了21世纪,然而迄今为止尚未有一本人类学的灾难研究文集被编辑出来。持续时间长、破坏力大的灾难在世界各地泛滥。现代知识和技术既未能清除人类所面临的自然

^① W. Torry 1979.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Hazardous Environment: Past Trends and New Horiz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20: 517-541.

威胁,也未能防止它们自身运作中所产生的危险,技术性灾难的威胁尤其在当代特别明显。随着灾难的频率和强度的增加,灾难的经济影响指数也在升高,在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大众之中,也相应对灾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环境学家们现在也意识到这一问题是他们关注的核心。对人类学家来说,灾难的影响远远超出其传统的工作地点,包括过去考察的主要地域——偏远的乡村,现在人类学的灾难研究也纳入了人口与其活动扩张的都市化工业中心。与人类学的主题(如适应、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这些在灾难中彰显的范畴一样,灾难给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分析社会组织和印证学科领域相关理论的难得的契机。

在灾难的人类学研究领域,已经呈现出四个大的、具有不同专题的研究范式。这四个范式间相互关联,它们也吸取并且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考古/历史范式

在过去几年里,考古学和文化史都发展出特殊的灾难研究方式,这些领域的研究极大提高了对灾难的时间深度的理解,对数千年来灾难的周期及其周期性反馈的探索即是一例。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不仅增进了对导致灾变的物质与社会进程的了解,而且也扩大了有关文化生存或损毁的灾后调适和适应性因素的知识;它们揭示出多少世纪以来形成的政治、经济脆弱性,其历时的观察具有重要的意义,延伸到了灾难的人类学研究的各个方面。考古学证据聚焦于物质文化,如栖息地、艺术、地形使用、政治领域的范畴、丧葬遗址等。这些证据显示出某一社会应对灾难时所具有的韧性这样的因素。考古学也揭示出一场灾难后社会的哪些成分得以再现?一些怎么会走向消失?为何消失?某一文化会形成哪些综合策略来应对灾难?甚或不经意间造成灾难的重复?灾难的历史背景在编年史、档案和年鉴中得以呈现,这些显示性文件或许并不专注于灾难,而是聚焦于政治和经济、尤其是人口变动和粮食生产方面,即便如此,它们也揭示出构成灾难事项的社会脆弱性构建,涉及有关政策、或歧视与行为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折射出微妙的社会复苏——有时甚至是以令人吃惊的方式反映出来。长期的田野工作更进一步加深了具有时间深度的视野和对历史背景的理解。对灾前状况的了解可以进一步厘清风险、辨识压力与制约的特征。

政治生态学范式

人类学的灾难研究的第二种取向为政治生态学范式,它源于近些年来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扩大形成了一种文化生态和政治经济观点相互交融的趋势。该范式既具广泛性又具多样性,涵盖人类与环境的诸多关键性问题,不仅与灾难攸关,也在灾难中得到显示;它可以被视为归属于社会文化的领域,因为就其最严格的人类学意义来讲,所有的社会都被认为是以文化的方式观察和接近其环境。不过,鉴于这一灾难研究的分支探讨的是影响和改变人类对环境利用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政策和势力,强调的是其他社会文化研究关注不足的环境利用与滥用,它理应作为不同的取向区别对待。

政治生态学观点多将灾难界定为与物质环境交叉的现行社会秩序的功能性反应,而非简单的地球物理极端现象,如地震、飓风和洪水的结果。导致灾难的灾害——自然或技术性的,源于人对环境的行为和人类对环境干预的强度。人类社会与其环境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分离的,处于相互构建与表述的持续过程中,人类群体为自己创造出物理的生境,其间又生产出能够保障持续性和强化社会和意识形态架构的生态场景。在政治生态学范式中研究的是一文化利用其物质基础生产食物和其他维持生计的必需品。物资的分配,尤其是社会资源的不同分配形式也需研究,因为它们对部分人来说,可以增进保障和福利,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形成危害,使其处于不利地位。正如某一人群的内部分化和对其他人口的依赖所产生的影响那样,一社会对物质领域的适应和人群对危害的韧性也在发挥作用。当面临灾害时,这些因素要么推进,要么削弱该社会的应对能力。作为适应和韧性的一方面,政治生态学范式记叙了多种现象之间的关系,如农业的扩大化、人口增加、环境退化和脆弱性的增大等。如果说环境是一种测试,而建构的社会和物质世界是答案,持续性生存是目的的话,那么从政治生态的观点来看,灾难就成为一种折射社会动态的镜面。

在政治生态学的框架里,适应性的观念范围近来有了一个大转向——不仅包括人们在环境中的成败,也包括受人们影响环境自身的活力。一个社会如何适应其环境的问题现在必须与一个环境在与社会交汇中怎样表现的问题相联系,相互勾连的问题上升到了突出的地位,源于环境受损和物理特征与

形式的误判所引起的灾难显然打破了这种相关的平衡。

在这一研究领导域, 政治生态学范式关注的范围超越地方, 延伸到世界的层面。在灾难不断增加的时代里所出现的问题是——不仅是某些群体, 甚至是整个人类共同体的生存能力实际上都在减弱。臭氧层的稀薄和扩大的温室效应的警示、一处的变动所引起他处的灾异、全方位和全消耗性质的当代工业和工业社会、无限度扩张的全球运输、交通和商务, 加大了所有人的危险系数(有些完全带有灾难的可能), 将政治人类学检视的问题提高到了全球的层面。

社会文化/行为范式

灾难对人类社会领域和文化具有深刻的影响。人类学的灾难研究的第三种范式涵盖了除掉那些直接针对环境的所有的社会与文化问题, 它针对的是大众及其机构, 以及社区共享的无形观念。人们在应对突发事变时会作出评估、调整观念和编织出解释, 灾后也会恢复和重建。他们怎样应对灾难或灾难预警, 显然是既借助了文化系统, 又对之进行了重构。灾难的社会文化/行为研究的范围也很复杂和广泛, 包括了诸多专题, 有些专题所涉及的领域之广, 它们自身都几近于独自的研究方向, 如受灾行为与反馈、风险与灾难的文化阐释和灾后社会与文化变迁等问题。

受灾行为与反馈

人类学家自开始与处于灾情中的人们接触起, 首先研究的是个人和群体对灾难事件和灾后影响的行为和反应。灾难是一种破坏强度大和波及面广的现象, 受其影响的人的思维和行为也是多方面的, 邻近灾难的社会科学家们不可能忽视灾难所引起的动荡。因此, 对行为和反馈的分析一直是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共享的重要研究命题。

首先, 人们在经历灾害时, 即便这场危机如一场干旱那样缓缓到来, 但他们毫无疑问会感受到一场历历在目的剧烈创痛。危机需要且涵盖了回应, 它所涉及的行为既有生物的也有哲学的。受灾的人会经历一段漫长的复苏阶段, 尽管在灾难与灾难之间、人与人之间, 恢复的过程各不相同, 需历经不同的阶段, 且每一阶段都牵涉到复杂的行为, 不过, 不管灾难在何处发生, 缘何发生, 所有的人所经历的受灾反应和复苏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惊人的

相似, 这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灾民们首先得解决居住与温饱问题。他们趋于在短时间达成团结与合作, 不过后来这种关系又会走向解体; 他们与周边的社区、援助机构和行政机构交流, 个人与社会也面临无数的牵涉宇宙观的困惑和具体问题, 它们引起人们的苦恼, 也亟待解决。人们寻求意义和解释, 凸显宗教和死亡的问题; 他们推出教规和仪式, 寻求表达悲悼的途径。人们通常会丧失基本的地方感——失去的不仅仅是住宅, 还有聚会场所、正式的公共中心以及具有社区和认同感的环境特质, 在此情形下, 地方归属感、自我和社会定义的问题会被推向前台。灾后的迁居和安置会对人口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两项工作在幸存者之中、在幸存者和灾难过程中的其他方, 如邻里、救援者和政府之间, 会引起纠葛。人们的时间观念、习俗和生存模式或许也会被中断, 不仅折射出他们先前的生活景象, 也促使他们重建其生活的场境。道德、伦理、法律和合法性的问题出现, 资源和财产获取的渠道受到影响, 经济层面的波动随之而产生。资源共享和不平等的问题形成, 尤其是个人利益与社区福利的对立现象增加。实际上, 灾难常常被看作是物质性的事件, 核心的关注点为物资、财产、地位和境遇。不过在金钱和物品之外, 会有一种受灾的场景——过去未曾有过的依附会出现。社会关系与忠诚度也发生了变化, 新的团体和联盟形成, 其成员常常会抓住灾难的机会夺取权力, 瓦解或重组权力格局, 形成霸权。灾难通常成为了政治团结、维权行动和新的蓝图构建的场景。灾难或许会迫使老的社会派别起来阻止新的派别的进程, 或在另一方面促进旧的体制走向改革。在行为反馈的分析中还包括了许多伴随危机、创伤和受难的诸多社会心理问题。在形形色色的因素中, 反馈、复苏与早期的脆弱性所涉及的范畴都不是单一的, 受年龄、种族、族群、阶级与性别因素的影响, 它们或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风险与灾难的文化阐释

人们以不同的文化和个体方式来查勘危害、评估风险, 分析什么因素实际上才构成灾难。在一个社会的各阶层中, 人们的观点有时一致, 有时差异很大。在灾民或隐性的灾民和各种非灾民的外来者中, 对真相的看法或一致或迥然相异; 同样, 灾难观念及其构建、风险的评估乃至灾难的定义, 以及这些观念产生争议的方式, 在灾难的文化研究中都

占据一定的地位。

所有的人在灾前或灾后都曾对其环境的特点和价值进行过评估,并与其所认为的无害和安全的标准相对照,其中也包括人们建构或界定其脆弱性的途径,乃至对其进行否定的方式。人们采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控制危险入侵他们的风险感知领域,包括那些无法直接验证的危险判断和对客观存在的威胁的否定。风险的感知是与引导一个群体的行为并影响其判断力的价值观与价值观的优化过程相连,食品、金钱、社会地位和钟爱的生活方式也许会超越对危险的考虑。人们在衡量其整个状况时,实际上都在赌博。评估的差异也体现在自然与技术的风险之间,也体现在对一环境“已知”的、且受不可预知的天然力控制的危险与那些无形的、或源于那些理应值得信赖的人所造成的危险之间。人类学对感知和评估研究的常见主题包括在地方和专家知识之间,或者发展商和环保主义者之间的风险评估对比,也包括了文化与价值观在形成风险观念时所起的作用。要研究风险观念的问题在方法论上并不容易,因为它们涉及到文化对现实建构的理论性问题,而且它们还包括了社会、物质和宇宙观场景中的意识形态。

作为对社会中风险、危险和脆弱性认知问题的辅助性研究,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已经拓展到对灾难的定义与所有权,或者对灾难的“架构”(framing)问题的探讨:谁有权宣布灾难?依据是什么?为谁?什么目的?——这些都是引发社会讨论的问题,也常常会引起歧见。因此,“架构”的问题和对其的争斗也成为了人类学检视的范围。在当今时代,尤其攸关的问题不仅是一场灾难的“架构”是怎样产生的,而且还是谁来操控这一“架构”的建立,以及支配具有说服力的话语。相关研究也聚焦于谁来认定“需求”?何为真正的能动性?谁来宣布一场灾难的结束?当一场灾难不被视为灾难时,对于受害者和环境来说,又会发生什么?

灾后的社会与文化变迁

灾难研究中有一个悠久的传统是将危害和灾难看作是社会结构和组织变化的载体。尽管自1920年普利斯(Prince)的灾难社会学研究以后,学者们这方面的关注相对较少,但人类学研究目前已经恢复了这一传统。实际上,这一题目吸引了人类学的社会文化及其政治生态研究两方面的兴趣。对该专题的讨论集中于灾难影响各阶段中的个人和群体

行为,以及在一定时间段内的偶发现象,关注点在于群体与新领导层的出现、个人、机构和不同社会阶层的调适与互动、外来的机构和组织的到来与逗留期间的干预、以及上述现象的永久性和瞬时性问题。

民族志田野清楚表明了灾难对宗教和仪式、经济和政治、亲属制及社会关系的影响。灾难影响技术,也影响对环境的态度和管理以及自然与文化生态的构建,这些问题往往容易挑起争端。灾难所带来的,即便不是实际的变化,也会形成变化的潜力。灾难向内部和外部的人暴露出亟需改变的状况。当然,变化的实现与否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变化的引入与守旧的对立,在诸多受灾的团体和派别之中引起了争议。

社会文化的持续力度,也即人们惯习的持久性构成了争辩中对立的一方。灾难不仅推动社会与文化重归以前的模式,也刺激它们走向变革。人类学的焦点就是扩大对灾前状况的研究,探讨它们在同一次灾难中如何对不同群体的灾后重建施加影响。一个社会的历史背景对于复兴与重建具有深刻的影响,常言道,“社区的过去在灾难应对中延续”。与此同时,根据人类学的观点,灾难很明显是推动变化的一个节点。

应用与实践范式

人类学领域很久以来就有部分学者从事应用和实践方面的研究,即将学科的知识在商务、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咨询工作中直接运用以达到具体的目标。鉴于灾民面临的诸多困难,需要一套迅速和可行的解决办法,灾难研究领域吸引了有实际与应用抱负的人类学家。应用研究就构成了人类学灾难研究中的第四种范式。

如同其他领域的灾难研究,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几乎在各个层面都潜藏着应用的取向。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学灾难研究的各个聚焦点实际上都揭示了被灾难困扰的个人、群体和社会的问题。不过,人类学研究中日益增多的著述明显具有应用的关怀与方法论的特点。灾难的种类和范围不同,研究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不过,应用人类学家们的注意力和行动方向多为预测、防范和减灾的问题——他们关注的是预警系统的建立、生活区域和工作地点的建设、以及救灾措施的施行。为减少脆弱性,减轻灾害造成的死亡与损失,他们提倡与传统的环境相适应的救援方式和地方性的技术知识;应用和实践

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 尽管当地管理人员自身也存在一些毛病和偏见, 但那些土生土长的人和机构通常比外来的组织更懂得如何安排和发放救援物资。人类学对灾民和组织机构的分析显示, 在确定救助和重建过程时, 各方的表现均有不同。田野调查表明社会中救援的分配通常是不均衡的, 以性别、年龄、社会等级和族群背景为标准的分配, 对人们要么有所帮助, 要么毫无帮助, 并且还表明了救助灾民时对地方习俗的无知和不尊重会怎样加剧幸存者所经历的障碍与困境。另外, 外来的救援机构对传统互助组织的漠视, 也会对社区造成损害。灾后的安置计划同样也往往忽视亲属关系和其他重要的地方组织。有时救援机构会物质化 (objectify) 灾民, 让受援者产生依赖的习性。较为常见的情况是, 灾后的救援在文化上完全不适宜且带有侮辱性。人类学与社会学也对救援组织的机构情况进行研究, 研究它们自身的作业流程、彼此之间的竞争、时间规划和价值取向。

人类学灾难研究的所有四种取向均孕育着一个大的人类学关怀——理论的发展与印证。

人类学家或其他的社会科学家是不可能从头到尾观察到某一文化或社会怎样在一群人中产生的, 所有的人类社会和文化状况在进入观察者眼中时已经确立, 并深深扎根于时间与惯习之中。不过, 灾难的发生会将研究者的视野前所未有地尽量拉近文化和社会的基本元素。灾难让人们回归源头——在动荡、解体和重组中, 它们暴露出行动的基本准则、行为的原生构架、体制的根基和组织的基本形态。它们消除多余的点缀、拆解无根基或偶然的结盟; 它们把新近的发展抹上的光泽拭去。正因如

此, 灾难给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可以对社会与文化建构的推论进行分析, 获取支撑或者混淆这些推论的数据, 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 提出新的假设。

灾难研究的学术已经给人类学家们提供了反思我们学界所持的源于西方思维的模式, 纠正那种认为社会与文化总是以固定或“惯常”的行为模式运作的观念。灾难研究已经表明, 有些社会不断调整以适应周期性的变化, 在一些场景中, 非常规也成了惯例。灾难研究不仅打造出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 而且在方法论上, 也强调了定性和定量分析资料的价值。

虽然人类学家极少用灾难的情况来推动其学术领域, 不过潜力也是很大的。对灾难场景的评析会越来越导向人类学的敏锐观察视角。

在某种程度上, 尽管灾难研究的几种人类学范式之间存在着差异, 但很明显的是, 它们也彼此交叉、渗透。考古/历史的观点不仅发现物与食品的生产技术, 而且通过对具工艺品特质的器皿的研究, 可以发现支撑人们在危险地带生活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及其构建与演进。政治生态的探讨与风险和灾难的文化阐释重叠, 共同关注谁控制文化发明和这种控制是怎样实现的问题。社会文化观对灾难反馈、社会心理创伤、风险观和变迁的关注, 使其具有应用和实践的倾向, 而应用的取向也与那些政治生态学的关注点相似。其他的研究方向也存在, 并且汇入这些主要的研究态势中, 如自然资源社区的构建以及灾难对它们的影响; 发展与灾难之间的联系; 以及灾难与健康的关系。

所有这些都扩大了人类学灾难研究的图景。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Disaster Studies

Susanna. M. Hoffman¹ & Anthony Oliver – Smith²; Trans. PENG Wen – bin

(1.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USA;

2.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Gainesville, USA)

Abstract: Recently, anthropological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have made much progress in terms of disaster studies. Anthropology has taken the disaster-related environmental, ecological and socio-cultural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and adopted the approaches of “archaeology & history”, “political ecology”, “social culture and behavior” and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With the absorption of some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from other branches of learning plu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macro-vision have made much contribution to disaster studies.

Key words: anthropology; disaster studies; approach and practice

(责任编辑 王东昕)